

阶级的失语与发声

——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 潘 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Abstract: Young female labourers have become a workforce that forecasts a new form of social resistance and a new round of “silent social revolution” at the grassroot level of society. In the radically transforming, post-socialist China, where a new body of workforce is taking shape, class construction and class deconstruction are going hand in h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working class has brought about a new type of social violence, thus posing a serious political problem that transcends the old resistance theories of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actions, non-political or political conflicts, local or global struggles.

1993年11月19日，一场大火吞噬了深圳的一间港资玩具厂，这是一间专门为欧洲某著名玩具品牌公司进行产品加工的分包厂。80多名工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另外50多人被严重烧伤，20多人受轻伤。惨剧震惊了国际社会，也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就好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遭受跨国资本的重创一般。大众传媒也仿佛突然之间才意识到，农民工们的确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场大火给中国社会笃信资本和市场的现代性梦想留下了永恒的伤疤。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既有希望和渴求的躁动，也充斥着发展所带来的罪恶，而在这个过程中，底层劳动阶级的牺牲被视为发展所必需的。在一个偶然的时机，我见到晓明，一个在这场大火中经历了与所有同乡姐妹们的生离死别而幸存下来的打工妹。正是她所经历的这场能使厂房崩塌却无法将年轻的打工妹们的梦想燃成灰烬的大火，让我十多年来一直匍匐地探索着一种关于社会抗争的次文体（Minor Genre of Social Resistance）。

一直到今天，晓明的生命仍然在我的脑海中闪着微光，忽明忽暗。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认识晓明——一个年仅21岁，刚从湖北农村老家出来打工不久的年轻女孩儿。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身上下几乎全部被烧焦，唯一幸免于难的那张美丽的脸上，闪动着一双明亮而纯真的眼睛。她看上去很虚弱，但却非常平静地说：

小孩子喜欢打架，喜欢蹦蹦跳跳，喜欢唱歌。可我喜欢跳舞，所以我想过或许有一天我能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到我们村可不容易了，我们村在大山里面，不通火车也不通汽车。要到我们家你必须得走上大约一个小时……

我们那里的人很穷，但是很单纯……城市里几乎没有什么信任。我不喜欢城里人。

我帮父母做了几年农活和家务，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喜欢种田，我也不喜欢。每个人都喜欢在“外面”干活很好玩，而且还能赚很多钱。

1990年，我和几个同乡一起离开家来到深圳打工，在一家制衣厂找到工作。那次是我第一次找工作。进厂前，管理者对每个人都要进行面试和笔试，那个时候我真是害怕极了。在厂里人人都争工作，争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孤单。

我告诉自己要做个成年人，无论厂里有没有同乡，我都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工厂安排我住在工人宿舍的一个小床铺上，我谁也不认识。那个时候我才尝到了人们常说的那种离家的“滋味”是什么，就是你只能一切靠你自己了。

但是刚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还是很兴奋的，大城市，高楼大厦，商店和那么多的人……就好像看电影一样。而我自己就在电影里面。无论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觉得自己特别土气特别单纯……

但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做得很不开心。厂子是个台湾老板开的，总是拖欠我们工资，本来

应该是每个月的第一天发工资，但是他们总是迟发，有时候迟一个月，有时候迟两个月……好在工资不比其它厂低，我每个月能赚到 300 块钱。

我是 1991 年 5 月离开那间厂的，我表姐介绍我到了现在的这间玩具厂，这个厂很大……我们干活很辛苦，从早晨到半夜，一天 12 个小时。每天都累得我精疲力尽……但在这里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有很多亲戚朋友在这里；我们经常聊天儿，还能互相帮忙。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再想过要跳槽去别的厂……每隔三个月我都会给在老家的爸爸寄 600 块钱，也给自己存几百块钱。我觉得自己至少能在这间厂干上几年。

但是后来却着火了，大火……

为了揭示打工妹们生命中无法逃避的社会暴力，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逐渐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背景之下，我踏上了寻找中国打工主体的漫漫长路，并尝试在当代中国——它正迅速成为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探索一种另类社会抗争的可能性。晓明的生命中不断闪现的火光、疼痛和记忆，凸显出这个时代的创伤，叙述着贯穿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每一位打工者生命之中的社会抗争。

这场大火已经过去十年。在迅速走向全球化的中国，我看到新的打工阶级正在挣扎欲出，当我试图去理解这种完全陌生而残酷的生活经验时，最令我感到困惑的是：中国打工阶级的生活状况十分窘迫，然而这个阶级的声音却不仅被国家机器建设现代化的轰鸣声所湮没，同时也遭到了普通民众（不仅是城市新兴的中产阶级，有时候甚至包括打工阶级自身）的普遍反感和憎恶。换句话说，一方面，阶级主体自身不能言说；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阶级这个议题普遍患有失语症。正是这种困惑驱使我欲将当代中国的阶级语境探出个究竟。然而荒谬的是，“阶级”这个词汇已经被淘空得只剩下一具躯壳，仿佛一个亡者盼望转世的幽灵。

中国并不是唯一主动引进全球资本主义要素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东欧的改革一样，中国政府面对国家计划经济的僵化结构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决定引进市场经济机制来解决社会危机（例如发展水平低下、就业不足、大量失业、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等），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Dirlik & Meisner, 1989）。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将发展经济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于是地方政府纷纷尝试将城市规划和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为了优先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地方政府毫不犹豫地实行严格的社会控制。在现代“大”都市的梦想与强化行政控制体系的欲望之间的巨大鸿沟中，便出现了剥削型的劳动力使用和管理机制。

中国的人口控制主要是通过户籍制度，这个制度正式建立于 1958 年，当时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居住地，而且还决定一个人的整个生活变迁——社会等级、工资、福利、实物配给量以及住房等（Solinger, 1991；殷志静、郁奇虹，1996；陆学艺，2002）。改革前的户籍体系单一而严格，即“城市常住居民户口”和“农村常住居民户口”。{5}在这种户籍制度下，农民的命运被农村户口禁锢在土地上。尽管户籍制度本身的漏洞造成了一些“非法”城乡移民的存在，但从数量上来看，他们绝对不可能改变农村与城市、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二元结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深圳市政府率先对户籍制度进行重大改革，颁布控制流动人口的暂行办法。在原来的常住居民户口基础之上增加了暂住户口，主要是针对短期务工人员。户籍制度与劳动力控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存在有助于劳动剥削机制的产生。政府利用户籍制度将城市中的人口区分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使政府无须承担向农民工提供住房、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福利的责任（Solinger, 1999；Mallee, 2000；Zhang, 2001；Tan, 2000）。城市需要农村人口的劳动力，然而一旦她们的劳动力不再被需要，她们便无法在城市继续生存下去。事实上，城市不允许新兴打工阶级在它的土地上生根。更糟糕的是，户籍制度与劳动力控制机制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建构出农民工模糊的身份认同，从而既深化又同时掩盖了对她（他）们的剥削。暂住人口是不是城市居民？农民工到底是工人

还是农民？这些问题的答案总是暧昧不清的（Andors, 1988, p40-41）。农民工地位的模糊性，有助于中国政府在没有充分认可其劳动者身份的情况下，仍可对其任加使用。正如索林格（1999）所言，这已经造成了一种即使不是畸形也是冲突的公民权（*cotested citizenship*）状态，这种状态不利于农民工们将自身变成城市中的工人。“农民工”这个词，模糊了农民身份认同与工人身份认同之间的界限，这便在无形中抑制了打工阶级的形成。

此外，城市政府不向暂住人口提供住房、教育以及其他环境基础设施。外来工们不仅自己不享有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其家庭成员也不被允许居住在城市，除非她（他）们自己也能够找到工作。外来工结婚和生育都不能在城市进行登记。官方仍然将外来工视为农民，认为她（他）们应该依靠其农村家庭网络的支持。因此，地方政府和外资企业不仅可以减轻负担，同时还可以从农村劳动力的使用中获利。而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则主要由农村社会承担。外来工是城市中的匆匆过客，一般来说，打工者——尤其是打工妹——结婚之前在城市工厂里的打工时间约为3—5年。她们对生活的长远打算，如结婚、生育等都被预期将在农村进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现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十分依赖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模式。在中国，无产阶级化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它并非由市场力量决定，而是由政治与行政力量决定，即通过政治与行政的力量将各种现存的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构整合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之中。由于中国农村地区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城市政府完全不需要担心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

简而言之，要想将经济特区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城市，必须依靠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的使用，而与此同时，国家和资本的论述却有意无意地否定打工者的“阶级”地位。模糊的身份认同是人口控制和劳动力控制等两种机制的奇特混合物，在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整合过程中，身份认同的模糊性有助于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和弹性。强调现代性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论述既将上述剥削机制合理化，又决定了中国新兴打工阶级的弱势地位，因为它甚至连一个表达自己存在的空间都未被赋予。新兴打工阶级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打工者没有在城市中安家的权利，因此就等于被剥夺了阶级生根的土壤。贫民窟是无产阶级可以组织起来发展成为阶级力量的地方。尽管广州、北京等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外来工的聚集区迅速扩张的现象（Zhang, 2001；王春光，1995；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飏，1997；赵树凯，1997），但在大多数城市中，这种聚集区通常是政府努力进行整治和清除的主要对象。农村的无产阶级化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生活都是短暂的，几乎没有人敢去奢望真正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农民变成工人。当外来工们被遣返回乡的时候，打工阶级在逆境中成长的“根”便遭到破坏。因此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政治与行政力量（尽管混乱）连同阶级的失语，共同决定了新兴打工阶级的形成和解体。

（《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

潘毅，《开放时代》，2005年 第2期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fr/deed.fr>